



JESL

Journal of Economic Studies in Literature

JESL, Vol. 1, No. 1, 2026, pp.51-71.

Print ISSN: 3107-3492; Online ISSN: 3107-3506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jesl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jesl260103cernc>



丁尼生诗歌中的殖民经济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构

杨国静 (Yang Guojing)

摘要：作为维多利亚王朝和不列颠殖民统治的文学代言人，丁尼生的诗歌深刻折射出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以及他对时代困局的回应。对殖民经济体制及其后果的再现和反思，构成其文学创作的重要动机之一。丁尼生早期作品对忧郁思乡与盼归的书写，不仅渗透着对庞大殖民经济棋局中那些倦怠棋子的深切同情，也体现出他对经济扩张所引发的族共同体解离危机的警醒和焦虑，他的中后期作品通过《洛克斯利田庄》等长诗，不仅抒发对殖民经济体制的盛世忧思，同时更是致力于通过重写亚瑟王传说，实现其凝聚与重塑不列颠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企图。

关键词：阿尔弗雷德·丁尼生 殖民经济 思乡 民族共同体 亚瑟王诗歌

作者介绍：杨国静，教授，上海财经大学人文经济思想与战略研究院院长，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英美文学、批评理论、文学与经济跨学科研究。邮箱：yang.guojing@shufe.edu.cn。

Title: Colonial Economy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in Tennyson's Poetry

Abstract: As the literary spokesperson of the Victorian era and British colonial rule, Tennyson's poetry profoundly reflects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of his time as well as his response to the predicaments of the era. The representation and critique of the colonial economic system and its consequences constitute a major motivation

behind his literary work. His melancholic writings of homesickness and boudoir yearning not only convey deep sympathy for weary pawns entangled in the vast chessboard of the colonial economy but also reveal his alertness to the ongoing disintegration of national community brought about by economic expansion. In his middle and later works, he continues to express his anxious meditation on the colonial economic system in long poems such as “Locksley Hall” and commits himself to rewriting the Arthurian legend in an attempt to reconsolidate a sense of British national community.

Keywords: Alfred Tennyson; colonial economy; homesickness; national community; Arthurian poems

Author Biography: Yang Guojing, Professor,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of Humanities and Economic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China.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ethical criticism, disability studies,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 and economics. E-mail: yang.guojing@shufe.edu.cn.

作为 19 世纪下半叶最具影响力的英语诗人之一，丁尼生（Alfred Lord Tennyson, 1809-1892）向来被视为维多利亚王朝和不列颠帝国统治的文学代言人，他的作品也常常被视为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真实全景照。这样的定位部分得益于他在近半个世纪的“桂冠诗人”生涯里，围绕重大政治历史事件创作出大量的应制性作品，不过更为重要的是，他的创作深刻反映出维多利亚时代的政治和经济状况，以及他为解决时代困局提供的个人方案。本文将丁尼生诗歌中无处不在的思乡与盼归母题为切入点，梳理他对帝国殖民经济体制下民族身份危机的盛世忧思，以及他试图以亚瑟王传说重新凝聚不列颠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努力。

一、作为殖民经济时代忧郁症候的思乡与盼归

丁尼生的崇高艺术成就主要得益于他对自身所处时代各种深层问题的沉思，在他那些严肃的作品中，读者们可以清晰感受到他对盛世假面之下种种危机的深重忧虑。正如丁宏为（2009, p. 61）所言，丁尼生对他所生活的外部世界有着“极其负面的表述”，而且其烈度“丝毫不低于卡莱尔、狄更斯和阿诺德等同时代主要作家的那些黑色的文字”。与卡莱尔、阿诺德等以理性的批判传世不同，丁尼生的负面表述主要存留于诗作的感性空间。至少在英语诗歌中，他的诗作可能是自浪漫主义以来最为阴郁的之一。无论是《玛丽安娜》《女郎

夏洛特》《食莲人》《尤利西斯》《提托诺斯》等短篇佳作，还是《公主》《悼念》《莫德》等长篇巨制，都渗透着浓郁的阴郁色调，而“思乡”母题则是造就此色调的主要根源之一。

在丁尼生早期作品中，《食莲人》所表达出来的思乡情尤其耐人寻味。诗歌最初收录于1832年版《诗合集》中，是对荷马史诗《奥德赛》所载“食莲人”故事的再创作。根据原书第九卷的记载，奥德修斯在自特洛伊返乡途中，经过食莲人的国度。这里的人表面上十分和善，他们以一种名叫“枣莲”（Lotos）的树果招待奥德修斯和他的水手。然而，吃过果子的人却失去记忆，不思归返。丁尼生的诗歌生动地再现了水手们进食枣莲后的状态：

……只要收下了放到

嘴里尝一尝，耳边的汹涌波涛

听来已像遥远、陌生海岸上的

悲泣和怒号；同伴的话声杳渺，

像来自坟墓；人清醒却似睡了，

怦怦的心跳像音乐在他耳中想着。

他们坐在岸边黄澄澄的沙上，

在西坠太阳和东升月亮之间；

这有多甜美：能梦见故土家乡，

梦见妻子儿女和家奴；但永远

像已倦于海上生活，倦于划船，

倦于荒芜的大海、动荡的水波。

“我们不再回故乡，”有人发声喊。

人人立即一起唱：“我们的岛国

远在大海的那头；我们不愿再漂泊。”（丁尼生，1995，pp. 60-61）

有趣的是，丁尼生的诗歌对原文做出一个意味深长的改编：《奥德赛》中的冲突主要存在于叙述者奥德修斯和水手之间，故事中的水手在吃下枣莲后便不思过往，“完全忘却回家乡”（荷马，2003, p. 155），以至于奥德修斯不得不“不顾他们的哭喊，强迫他们回船”，强行将他们“缚在桨位下面”，离开这个魅惑人心的恶岛。但是，《食莲人》的叙述者转换为食莲的水手（诗歌的“合唱”部分尤为明显），冲突主要展现于水手们深切的思乡情和对无尽苦旅的控诉。在这里，吞食枣莲的目的不是忘记过往，而是水手们与亲人和故土梦里相见的唯一手段。相反，四方漂泊则是最深重的苦难，让人生看不到任何希望：

我们已受够了操劳和漂泊的熬煎，
在恣意汹涌的浪涛中被掀到右舷、掀到左舷，
而翻滚在海水里的怪兽喷着满是泡沫的喷泉。
让我们一同起个誓，并从今后矢志不移：
要定居在这个处处是山谷的枣莲之地，
像并不操心人间事的天神在山上闲倚。

……

终于在长春花的床上歇歇累透的双手双足。
错不了，错不了，酣睡比劳作甜美，在岸上
远胜过在深海大洋之上凭木浆苦苦斗风浪；
休息吧，水手兄弟们，我们不愿再漂泊四方。（丁尼生，1995, pp. 67-68）

由此，通过创造性改写，丁尼生将《奥德赛》中浑浑噩噩的水手，改造成一群领悟到返乡愿望已然成空、绝望中不愿继续承受舟楫劳顿之苦的觉醒者，从而让《食莲人》展现出与原作截然不同的情感张力。这样的觉醒者形象在丁尼生的创作中并不孤单，1864年发表的《伊诺克·阿登》提供了一个更为现实主义的案例。诗歌讲述了一个类似《鲁滨逊漂流记》的故事，与后者的圆满结局不同，主人公伊诺克的经历令人唏嘘：在“百年之前”

的一处英格兰乡村，他与好友腓力自幼一起长大，两人都爱上儿时玩伴安妮，但伊诺克幸运地赢得了安妮的芳心。随着工业经济时代的到来，从事传统农渔产业的伊诺克生活日渐困顿。于是，他不顾妻儿的苦苦哀求，加入远航商队的海员队伍。在遭遇沉船之后，他孤身一人开始漫长的荒岛生涯。在伊诺克失踪十余年之后，安妮最终接受了腓力的求婚，开始新的生活。最终，当艾诺克获救并返回故里后，却发现爱妻已经改嫁，自己的儿女们也在新家庭里幸福地生活。伊诺克决定不再打扰他们的生活，一个人在孤独中悲惨终老。

毫无疑问，伊诺克深爱自己的家庭，他之所以不顾妻儿的坚决反对冒险远航，正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的小农产业正遭遇工业经济的体系化挑战，担心他们从此食不果腹，甚至不得不乞讨为生（丁尼生, 1995, p. 264）。相反，尽管远航中国的贸易商船面临重重风险，但是它的巨大经济收益毋庸置疑。伊诺克坚定地相信此行能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

……对，去两三趟——

需要几趟就几趟。最后有了钱，

回来做一艘较大商船的船长，

挣来足够的钱过较好的生活，

使他所有亲爱的孩子受教育，

让余生在亲人之间安宁度过。（丁尼生, 1995, p. 265）

置身 18 世纪中叶的英格兰，伊诺克的美好规划完全合乎情理。当时的英国尚未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但是与纷乱的欧洲大陆不同，君主立宪政体的早早确立保障了它近一个世纪的相对稳定，此间经济高速发展，海外殖民快速推进。依靠东印度公司这类半军事化经济殖民组织，此时的英国已经在全球海洋贸易中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18 世纪中叶至 19 世纪初，仅东印度公司的贸易量就占据当时世界贸易近一半的份额）。随着贸易量的快速增长，大量的远洋商船穿梭在各大航道之上，海员人手的紧缺成为常态，远洋经济贸易也因此成为英国最为赚钱的行业之一。同时，随着殖民经济的快速拓展，大量青壮年以驻军或管理人员身份被派驻海外。特别是像伊诺克这样的底层民众从这类新生行业中看出逆天改命的契机，从而不惜抛弃故土和亲人，远涉重洋。然而，常年的海上航行和奔走他

乡，也让他们像困守荒岛的伊诺克一样，即便置身天堂般的异乡美景，依然对故土魂牵梦萦：

在赤道另侧、日照较少的岛上；

孩子们的咿呀呀呀、安妮、小屋、

上坡的街道、磨坊和巷间树荫、

孔雀形紫衫和孤零零的镇公所、

他赶的马、他卖掉的船、凉凉的

十一月拂晓和沾露的幽暗山丘

……

年复一年来又去。想看看亲人，

想在神圣的故乡旧里漫步的

愿望尚未泯灭……（丁尼生, 1995, pp. 285-286）

虽然《伊诺克·阿登》描画的是 18 世纪中叶的情景，但是对于主人公的思乡情，丁尼生同时代的读者们不仅能感同身受，甚至可谓殆有甚焉。众所周知，19 世纪中期正是英国综合国力最为鼎盛的时期。伴随全球殖民体系的确立，大英帝国的经济和社会迎来空前繁荣，成为名副其实的“日不落帝国”。但是，在其烈火烹油的盛世景象之下，帝国版图之内也危机四伏：在其英国本土上，基督教信仰危机和严重的阶级分化带来阿诺德所谓的“无政府状态”，而在南非、印度和加勒比海地区等殖民领地，民族主义意识的觉醒导致殖民经济的社会治理成本越来越高昂。动荡不安的政治局势、残酷的经济掠夺、不断高涨的民族抗争，乃至殖民统治内在的非正义性对人性的持续扭曲与拷问，都让长期驻守海外的殖民者产生深重的疲惫感和倦怠，加重他们对英格兰故土的思乡。虽然在世纪末的吉卜林那里，这种倦怠和思乡情得到更为丰富的表达，但是丁尼生作品的这一情感底色同样极其鲜明。

与食莲人和伊诺克的思乡和疲惫相对应的，是那些留守故乡之人同样深切的盼归和绝望之情。在《伊诺克·阿登》中，安妮在送别伊诺克时便已预感苦难的到来，声称自己

“再也见不到你的这张脸”（丁尼生, 1995, p. 286）。在此后的十余年时间内，她独自拉扯三个年幼的孩子，维持全家的生计，又不得不承受幼子的夭折和生活的日益窘迫。虽然腓力一直在默默无私地相助，但是邻里间早已流言四起；在无数个不眠之夜里，安妮都不得不面对“我的伊诺克可还在？”的无比凄惶（丁尼生, 1995, p. 280）。诗歌《玛丽安娜》塑造出又一位被遗弃女子的孤苦情状：她孤身一人生活在“围有水沟的农舍里”，房屋残破腐朽、花床覆满青苔、草棚长满荒草，毫无希望的她只能日复一日盼望心上人的归来，却又绝望地意识到这一天绝无可能：

她只说，“我的生活多凄惨，

这人不再来了，”她说道；

她说道，“我感到厌倦、厌倦，

我巴不得死了倒好！”（丁尼生, 1995, p. 7）

玛丽安娜本是莎士比亚《一报还一报》中的角色，丁尼生借用原作中她被情人抛弃之后的绝望口吻。不过，借用也就到此为止，这首诗歌没有任何影射原作的痕迹，而只是聚焦于一位孤苦无助的弃妇对周边环境和日月晨昏的观察，而所有的环境描写与其说是莎士比亚笔下的维也纳，毋宁说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乡村。换句话说，绝望的玛丽安娜是丁尼生对维多利亚时代众多留守妇女的真实描摹。由于远洋贸易或殖民远征，她们的丈夫常年无法回归，让她们对美满婚姻和幸福家庭的渴望化为泡影。诗歌共有七个十二行的诗节构成，而此处引用的四行诗句以略有变动的形式出现在每个诗节的结尾，以一种副歌的形式形成一咏三叹的效果，让女性的绝望力透纸背。同样的绝望也是丁尼生另一名作《女郎夏洛特》的核心主题。这首作品取材于丁尼生极其钟爱的亚瑟王传说，说的是阿斯特拉的艾琳（Elaine of Astolat）深爱着兰斯洛特（Lancelot），但后者却只钟情于亚瑟王的妻子格尼维尔（Ginevere），导致她最终抑郁而终的故事。丁尼生没有直接提及艾琳，而是以无名女郎相称：她孤居河流中央的沙洲城堡夏洛特，目睹两岸行人和河中帆船穿梭往返于王城卡默洛特，那里有她心上人的足迹以及关于她的各种传说。然而，她自己却不得不日夜困守孤堡，与织机为伴，等待永远不会再来的兰斯洛特。最终，她躺入小舟，“让宽阔的河载着她远去”：

他们听见的歌忧郁圣洁，
一会声音高，一会声音低，
唱到她血液渐渐地冷却，
唱到她完全丧失了视力——
望着城堡卡默洛特。
她随波逐流地一路漂去；
没漂到岸边第一幢房子，
已在自己的歌声中去世——
去世了，女郎夏洛特。（丁尼生, 1995, p. 81）

诗歌将繁华忙碌的外部世界和孤岛困守的女郎相对立，一边展现行旅匆匆的外部世界，那里充满大船丝帆，各行各业的男男女女，一边展现无人顾念的女郎坐守寂静的绣房，在窗后镜前叹息翘首，凝视投射于镜中的影像，那里虽然真实地映射出外部的繁华，却与她毫无关联。她在绝望中空耗时光，直到生命临近终点时才决定迈出孤岛。然而，那与其说是一次勇敢的行动，毋宁说是绝望的挣扎：在她的小船靠近“岸边第一幢房子”之前，她便已经带着遗憾离开了人间。这首作品虽然描画的是一幅中世纪的田园图景，但是它所传达的情感同样能深深触动 19 世纪英国读者的心灵。对于那些情人、丈夫或父兄兄弟因为经济殖民而远驻他乡的女性读者来说，无名女郎的悲惨境遇也正是她们自身遭遇的真实写照。

二、帝国扩张与共同体身份焦虑

当然，物理意义上的思乡和盼归不过是帝国时代的显性症候，在丁尼生诗歌的阴郁底色之下，潜隐着他对所处时代更深刻的忧思，那就是殖民经济体制带给英国社会和人口结构的重大冲击，以及随之而来的深重的共同体身份焦虑。这也正是他的英国同胞们不得不共同面对的重大挑战：不论是行走不同肤色与面孔之间的海外驻守人员，还是目睹着身边的城市和乡村日益国际化的境内居民，他们都在一边享受着帝国体制带来的丰厚经济回报，一边承受着身份认同难以安放的焦躁与不安。

众所周知，在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期内，英国的全球影响力达到顶峰。经济繁荣的一个直观指标便是人口的快速增长。据测算，英格兰人口在 12 和 13 世纪已经达到 400—600 万的规模，然而，在黑死病和严重饥荒的双重打击下，该地区人口在 14 世纪中叶锐减至 220—310 万，直到 1750 年，英格兰的人口才恢复到约 574 万，达到与 14 世纪危机前持平的水平（Jefferies, 2005, pp. 2-3）。进入 19 世纪后，本岛地区人口开始激增：在 1801—1850 年间，英格兰地区的人口几乎翻了一番，由 830 万上升至 1680 万，而此后的 50 年，该地区的人口几乎又翻了一番，截止 1901 年，英格兰地区的人口已经高达 3050 万（Jefferies, 2005, p. 3）。同时，英国也是全球第一个进入“人口转型”（即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转变）的国家。一方面，自 1750 年开始，英国政府通过推行天花疫苗接种、灭蚊等一系列防疫行动，使得死亡率在 18-19 世纪之交明显降低（Harris, 2005, p. 488），另一方面，英国本土人口出生率在 1860 年代达到峰值后，在此后半个世纪的时间内下降了一半（Pooley, 2013, p. 83）。鉴于同一时期内的总人口依然保持强劲增长，不难理解，19 世纪的英国人口结构必然发生了深刻的内在变化。

自 5 世纪初以来，盎格鲁—撒克逊白人作为英格兰地区主体民族的地位至今没有动摇。根据 2021 年人口普查数据，当前英裔白人占总人口依然高达 73.5%。然而，至少自 18 世纪末开始，随着大规模黑奴贸易、远洋贸易和全球殖民的推进，英国社会的民族构成开始成为一个问题。一方面，伴随着黑奴贩卖在内的殖民贸易开展和全球暴力征服，大量英国青壮年男性主动或被动四方漂泊或移居海外。仅在澳大利亚一地，截止 1850 年代，移民定居者便已达 40 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因罪流放或从事淘金业的英国白人。此外，还有大量民众纷纷前往加拿大、新西兰、加勒比地区寻找机会。与此同时，由于四处殖民，大量英国的官员、士兵和公务人员被派往印度、非洲、加拿大和加勒比海地区驻守，成为庞大的经济殖民机器的一部分。虽然殖民地暴力冲突往往在规模和影响上不及拿破仑战争（1803-1815）和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这种列强之间的争夺，但是由于多数发生在非洲、亚洲和加勒比海等帝国边陲区域，且常常源于经济剥夺和非正义性，它们带给参战官兵的身心创伤同样极为巨大。另一方面，为数众多的欧洲大陆、非洲、亚洲和拉美民族开始登陆英格兰。随着英国成为全球贸易中心，大量异族人口被输入到英国本土，出现在伦敦、曼彻斯特、利物浦等工贸大都市的街头。据 1841 年统计数据显示，当时生活在英国的异族人口为 44780 人，其中仅在伦敦地区便有 19148 人（Great Britain Courts, 1844, p. 51）。他们当中有随早期贩奴活动登陆英国的非洲黑人以及他们的后裔，有受雇于东印度公司、往返英国和亚洲各国的亚洲商务文员，还有来自各殖民地和全球贸易伙伴国家的学生、学者。随

着大量异族人口的涌入，英国传统文化遭受到外来政治经济体制和宗教文化习俗的深切侵扰，社会结构也变得日益复杂和动荡。

事实上，移民涌入至少自 18 世纪下半叶已经成为英国社会的重要关切。例如，18 世纪后期著名歌曲创作者狄布丁（Charles Dibdin）一边着力塑造爱国、忠诚的本土海员形象，为经济殖民张目，一边却恶毒诋毁异族水手和工人，担忧他们对英国社会的破坏：

有这么一种疯狂的怪人吗？他们的头脑

容不下理性的入侵？

他们的思想如此放荡，

冲开波浪，劈裂狂风——

他们身穿布毯长袍，头戴草制冠冕，

对疯狂的臣民施行疯狂的法律！

如果这能让你理直气壮，

快，恶魔们，快滚回你们的囚牢！（Dibdin, 1845, p. 141）

从狄布丁的外貌描写不难推断，这群“身穿布毯长袍，头戴草制冠冕”的异族很可能来自南亚或者东亚，他们被视为一群完全没有理性、举止放荡、行为乖戾的化外之民，是破坏英国社会的恶魔，只配生活在他们自己的地狱般国度里。这种敌意并非来自狄布丁的个人怨愤，而是有着深厚的时代特征——这些爱国水手歌曲正是在时任英国首相的小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授意下创作而来的（Land, 2009, p. 5）。同样的情绪也在同时代众多作家那里得到广泛回应，例如，约翰逊（Samuel Johnson）便在他的《爱国者》（“The Patriot”）一文中系统地阐述了异族和移民对培育爱国主义精神的负面影响，表达出对他们撕裂英国社会的忧虑（1968, pp. 91-99）。潘恩（Thomas Paine）《人的权利》（*Rights of Man*, 1791）的发表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忧虑：该书所倡导的人生而平等并享有自由、财产、安全以及反抗压迫等权利的观点在保守主义盛行的英国引发广泛论争，其中的焦点之一便是担忧潘恩的平权思想和国际主义倾向会严重伤害英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文化传统（Paine, 1791）。对此，摩尔（Hannah More）曾在《乡村政治》（“Village Politics”）一文中借两位乡

村手工业者之口，对《人的权利》宣扬的核心观念进行逐条批判，揭露这些外来观念可能的危害（1840, pp. 58-63）。另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人口原理》（*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一书在 1798 年的出版。这部具有革命意义的著作第一次质疑了人口增长必然带来经济财富和国力积累的传统观念，指出不加控制的人口增速必然超过生存手段的增速，引发食物匮乏、灾荒乃至社会发展的停滞和倒退（Malthus, 1872）。该书观点深刻呼应了英国社会面对近两个世纪的人口快速增长所引发的忧虑，并促生了 1800 年的《人口普查法案》，由此建立的十年一次人口普查制度贯彻至今。虽然该书没有专门讨论外来人口对英国社会带来的冲击，但是它频繁拿英国与经济欠发达的非欧洲国家做比较，事实上加大了英国社会对异族涌入的焦虑，激化了普通民众的仇外情绪。例如，在论及中国的巨量人口时，马尔萨斯引用耶稣会士马若瑟（Joseph Henri Marie de Prémare）在 18 世纪初的观察，指出中国虽然土地肥沃、农业发达，但是由于过度鼓励生育，导致其三分之一的人口“难以获取充足的稻米维生”，以至于很多母亲不得不亲手杀死或遗弃多生子女，到处都存在着卖儿鬻女、盗匪横行的现象（Malthus, 1872, p. 105）。且不说马若瑟对清朝康熙时期的观察是否全面和公允，对于 18 世纪末的英国读者来说，马尔萨斯对前者的引用显然会强化他们对“野蛮”外族的偏见，加剧他们对外族入侵的焦虑。相对于马尔萨斯深重的异族偏见，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对于帝国治下的异族苦难深表同情。在他发表于 1795 年的一篇演讲中，他对仅在东印度群岛地区就导致八百万人丧命的殖民经济体制大加挞伐：

有公开信息宣称，我们与东印度群岛的贸易往来已经造成八百万人丧命。作为这类最肮脏、最令人心痛罪恶的回报，我们得到了黄金、钻石、丝绸、平布和印花布，供贵妇和妓女们享用。茶被用来制作有害的饮品，瓷器被用来饮茶，硝石被用来制造火药，以便我们再用这些火药屠杀提供这些物品的可怜住民。我们投身到可怕的罪行之中，却没有换回来任何必需乃至有用的东西。至于此类可怕话题在非洲和西印度群岛上的情况，我眼下不打算多谈。一想到它们，我就垂头丧气，它们给我们的民族性格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污点——耗尽大海之水，也无法洗净，所有阿拉伯的香水，也无法使它散发芳香。（Coleridge, 1971, p. 226）

柯勒律治对大英帝国以异族鲜血铺就远洋贸易之路的做法深表怀疑，认为它并没有带来任何真正必需的东西，相反，它却成为英国人民族性格上洗不掉的污点。对于柯勒律治而言，这样的污点固然源于不公正的经济贸易让英国人产生的沉重负罪感，同时也源于国际化的商品交换正在改变英国人的社会风气和消费习惯。黄金、钻石成为贵妇和妓女的生活点缀，茶和瓷器成为昂贵的日用品，这些外来物品助长了英国国内的奢靡风气，扭曲了柯勒律治极为珍视的英国民族性格。

进入 19 世纪之后，越来越“国际化”的人口构成让英国社会益发焦虑，仇外情绪进一步加剧。在此过程中，爱尔兰人、犹太人和来自亚非地区的有色人种成为主要的仇视对象，甚至众多的进步学者都受到这股仇外情绪的裹挟。例如，著名散文家兼政论家科贝特（William Cobbett）曾声称“黑人是一个头脑糟糕的种族，他们生来就是受奴役和被主宰的命”（1804, p. 25）。他也毫不掩饰对爱尔兰民族的鄙视心态，在《乡村经济》（*Cottage Economy*）中，他将爱尔兰人的主食土豆称为“懒根”（lazy root），强调“它也是邋遢、污秽、不幸和奴役之根”，认为土豆在英格兰的种植导致贫民的增加，并庆幸英格兰最终转向谷物为主的农业经济（1824, p. 62）。同时，他将最恶毒的话语瞄准生活在英国的犹太人：声称自己对犹太人的憎恶与自己的先祖没有区别，认为犹太人嘲弄基督教和基督徒的道德观念，靠高利贷和诈骗谋生（1830, p. 730）；他警告英国的贵族与绅士阶层警惕犹太金融资本的兴起，认为这些“犹太橘子男孩”正在通过购置地产将伦敦变成“犹太人的脓包”（1823 March, p. 565），甚至主张基督教国家没有犹太人的葬身之所，应该将“他们的尸骸扔进大海”（1823 October, p. 217）。^①同样，尽管狄更斯被广泛视为维多利亚时代的良心，他的文学作品也和科贝特的政论文章一样，流露出一种不安的异族恐惧。在《小杜丽》（*Little Dorrit*）和《艾德温·德鲁德之谜》（*The Mystery of Edwin Drood*）等中后期作品中，这种倾向尤为明显。有学者指出，这两部小说都暴露出对来自东方经济和个人威胁的焦虑。它们都试图从与外国人的社会和经济联系入手，来呈现情感和经济债务以及扭曲的家庭关系，由此传达出一种微妙的身份危机意识，即“尽管积累财富看上去是英国人格外在行的行为，消费外国财富却触发强烈的仇外反应，因为它威胁到——至少说在想象中——对英国人自身身份的褫夺”（Tromp, 2013, p. 32）。

^① 科贝特的反犹太倾向导致科贝特学会不得不在 2021 年取消旨在庆祝其名作《骑马乡行记》（*Rural Rides*）出版 200 周年的庆祝活动，参见 Napier, Andrew. “The Cobbett Society Reacts to Celebration Event Cancellation.” *www.Hampshirechronicle.co.uk*, 14th March 2021, retrieved 23rd August 2024.

由此可见，在进入 18 世纪后的近一个半世纪里，英国的民族心理发生了十分复杂的变化。一方面，得益于先发资本主义制度和工业革命的优势，英国快速地由一个欧洲边陲岛国崛起为全球首屈一指的强大帝国，强大的综合国力、相对稳定的政治形势和日益改善的生活水平让英国民众产生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另一方面，与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能够在短时间内得到快速提升不同，一个民族共同体性格的形成往往有赖于特定的地域环境和漫长的时间滋养。在由边陲岛国向全球帝国快速迈进的过程中，大量外来文化和人口的涌入对英国的主体文化和传统必然形成较大的冲击，让作为主体民族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对自身经济文化传统的脆弱性倍感焦虑。相应的，他们对外来民族和文化产生怀疑、排斥乃至仇视的态度也就在所难免。这种共同体身份焦虑是我们理解丁尼生诗歌中无处不在的思乡与盼归母题不容忽视的重要变量。

三、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与重塑

毋庸置疑，丁尼生对思乡母题的偏爱可以从他相对阴郁悲观的个性特征、早年严重的情感创伤经历、以及他对济慈、华兹华斯等浪漫主义诗学先驱的效仿等维度得到解释。不过，它更加折射出丁尼生在面对分裂的民族共同体意识时的内心焦虑，以及他试图以诗歌创作重新凝聚英格兰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努力。

作为一位几乎与整个 19 世纪同行的长寿作家，一位任期长达 42 年的皇家桂冠诗人，丁尼生和他那个时代的绝大多数普通人一样，在很长的时间里持有强烈的帝国主义情怀。他的大量诗歌作品，特别是他作为桂冠诗人创制的应制作品，都流露出作家作为帝国子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表达出对帝国治下繁荣和和平的歌颂，以及对殖民经济体制的拥护。例如，在惠灵顿公爵逝世之际，他对这位击败拿破仑、为大英帝国奠定百年和平（“Pax Britannica”）的民族英雄推崇备至，声称要“以一个帝国的哀伤”埋葬这位伟大的公爵，而他的伟大不仅在于他个人的历史功绩，更在于他是每一个英国人的完美代表：

不止一次，这粗犷岛国的历史证明，

责任之路便是荣耀之路：

走在这道路上的人，只会渴望

追求正义，并学会压制

对自我的爱，在旅途结束前，
他会看到坚强的蓟花绽放，
开出鲜亮的紫色，比所有
娇艳的花园玫瑰更为鲜红。(Tennyson, 1970, vol.2, p. 218)

在丁尼生看来，正是一代代惠灵顿公爵这样的民族楷模让英国走向荣耀之路，成为全球霸主。他们充满责任感，不辞辛劳，终生奉献于拓展帝国影响的伟大事业，他们追求正义、节制自我，不断用自由和知识创作一个更美好的人间。同样，在应维多利亚女王加冕五十周年庆典创作的诗歌中，他一边赞颂女王摆脱了惯见于帝王的暴政作风，“处处优雅、温和、伟大的女王风范”，声称她所取得的成就让同样长期在位的亨利三世、爱德华三世、乔治三世等先王们黯然失色；一边赞美她是帝国和谐统一的象征，带来了“不断拓展的商业”、“不断昌明的科学”和“不断扩张的帝国”（Tennyson, 1970, vol.7, pp. 9-10）。进入 19 世纪后期，帝国统治的体制性弊端日益凸显，特别是在印度民族大起义（1857 年）和第一次布尔战争（1880 年）的严重冲击下，帝国的殖民经济体制岌岌可危。即便如此，丁尼生依然表达出对该体制的支持。1886 年，被爱德华七世（时任威尔士亲王）称为旨在“促进商业发展并加强女王陛下帝国各地现有联系纽带”（Mathur, 2007, p. 57）的“印度暨殖民地博览会”在伦敦举办。在为纪念此次活动创作的诗歌中，显然已经意识到帝国体制危机的丁尼生写道：

我们曾经将过往的荣耀分享，
兄弟们，难道最终必须分离？
我们难道不分善恶
依然要将彼此切割？
不列颠万千声音呼喊：
“孩子们，要彼此焊连，

融入一个帝国的整体，

为了同一个不列颠全心全意！

同一生命，同一旗帜，同一舰队，同一王座！”

英国人，坚守你们的荣耀！（Tennyson, 1970, vol.6, pp. 346-347）

不难看出，面对印度及其他殖民地的离心离德，丁尼生的话语间无比痛心。他呼吁所有的殖民地应该和不列颠本岛同心同德，融入到同一个帝国的有机体之中，在同一面旗帜下捍卫大英帝国的共同荣耀。这类充满主旋律色彩的作品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民众的某种普遍心理，但是，正如前文所言，丁尼生绝非帝国的廉价喉舌，他对帝国主义的内在危机有着相当清晰的认知。在评价 1886 年前后的丁尼生时，巴克利指出，此时的丁尼生早已不再有他那一代人的盲目乐观，而是秉持“一种彻底幻灭的立场”（Buckley, 1969, p. 8）。也就是说，尽管在部分应制性作品中，他依然呼吁一种超越地域、种族和民族的帝国共同体意识，但是，在那些更具个性化的创作中，他显然更加忧心忡忡于那些随帝国扩张而来的各种社会症候，其中就包括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碎裂和分化。他的大量中后期作品表达了对这一困局的忧思，以及试图借助文学创作重建英格兰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努力。

长诗《洛克斯利田庄》（“Locksley Hall”）第一次清晰地表达出丁尼生对殖民体制弊端的反思。该作品发表于 1842 年，丁尼生沿用了一种类似于艾布拉姆斯（M. H. Abrams）所谓“宏大浪漫主义抒情诗”（greater Romantic lyric）的结构，并以戏剧独白的方式呈现了叙述者早年的创伤性情感经历，以及他个人对未来的展望。虽然诗歌的主体部分聚焦于叙述者的个人成长，但是却时刻传递出置身时代洪流之中的焦躁不安感：他被“突然投入到这样的时代”，茫然不知如何安身立命。他发现这个世界“每扇门都已被黄金封好，只能用金铸的钥匙开启”，到处充斥拜金逐利之人，到处炮火隆隆，烟尘四起，将士们远离家乡，将战争和征服带向每个角落。在这样的时代，战火的伤痛无法用崇高的荣誉来抚慰，只能用“金币的叮当声”来缓解；贸易和殖民没有给世界带去和平和正义，只是让被征服的列国如丧家之犬一般，“冲着他人的脚跟嘶吼”（Tennyson, 1970, vol. 2, pp. 42-43）。在展眼未来时，说话人预见了一幅更为可怖的场景：

我曾深入未来，直到人类眼睛所及的远地，

看见世界的图景，以及未来的一切奇迹；

看见漫天充斥商贾，魔法角帆下队队船舶，

紫色黄昏中的导航者，卸下珍贵的包裹；

听见漫天流荡的叫喊，滴落一片阴森的露水，

各国雄赳赳的舰队在深蓝远海里彼此竞追；

遥远的南方暖风劲吹，带来世界各地的低语，

随同各民族的旗帜，在雷暴之中飞舞。(Tennyson, 1970, vol. 2, p. 44)

说话人承认，商贾横行的大海、喧嚣嘈杂的叫喊、往来穿梭的各国舰队，特别是随南风而来的遥远语言以及世界各地的旗帜都曾经让自己激情万丈，然而，如今他所看到的却是“一切秩序都在腐烂，所有事物都已脱节”；那些过去一直被标榜为社会进步标识的东西，到头来不过是部分人积聚财富的勾当，甚至缓步向前的科学带来的也不是可预期的美好生活，而是“一个饥饿的民族，宛若一头近逼的猛狮”(Tennyson, 1970, vol. 2, p. 44)。

如果说 1842 年的丁尼生只不过心怀不祥预感的话，那么在他 1886 年发表的续篇《洛克斯利田庄，六十年后》(“Locksley Hall Sixty Years After”)中，他则彻底参透了时代的“物质主义和重商主义”的本质，承认自己“年轻时的种种希望到头来毫无根基”(Marshall, 1963, p. 222)：

难道我们与科学同行，在时间中收获荣耀，

却无视城市孤儿失落黑暗的灵魂，任他们摸索在城市的泥滓？

在阴暗的小巷中，进步因麻痹的双足而滞留，

犯罪和饥饿将我们成千上万的少女逼上街头。(Tennyson, 1970, vol. 6, p. 298)

尽管法国大革命最初的暴力和血腥深深震撼了 19 世纪初的英国社会，但是来到 19 世纪末，前者所呼吁的科学、进步、民主思想已经相当深入人心，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丁尼生直言不讳地质疑这些进步理念，十分耐人寻味。他在诗歌中，他以辛辣的口吻嘲讽“地球终将是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一个单一种族，一种单一语言——”（Tennyson, 1970, vol. 6, p. 293）的帝国主义雄心。同时，对于那些为了这个虚幻的雄心献祭自己生命的年轻人感到无比惋惜。在著名的《轻骑兵队的冲锋》（“The Charge of the Light Brigade”）中，丁尼生聚焦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期间英军的一场惨败。1854 年 10 月 25 日，由于英军主帅萨姆塞特（FitzRoy Somerset）的错误指挥，英军轻骑兵团 600 名将士在布卢登内尔（James Brudenell）带领下向敌军炮兵阵地发起正面冲锋，致使部队身陷绝境，近半伤亡。诗歌中，丁尼生高度赞颂士兵们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不过，更为重要的是，言语之间他对士兵们葬身异国他乡的死亡谷地深表痛惜，同时也表达了对这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不义战争的谴责：

“向前冲，轻骑兵！”

可有人丧气？没有。

尽管士兵们知道

是错误命令。

他们可不能抗命，

他们可无法弄清，

只能奉命去牺牲。

骑兵六百名

冲进死亡的谷地。（丁尼生, 1995, pp. 168-169）

由此不难发现，对殖民扩张及其后果的反思一直是丁尼生中后期创作中的一条暗线。受制于历史局限、特别是他的公共身份，他在很多时候将英国的殖民扩张视为文明进步的必然，然而，他又敏锐地意识到殖民扩张带给英国民族身份的巨大冲击，并对如何重构英

帝国民族身份认同倍感困惑和焦虑。就此而言，泛滥于丁尼生作品之中的“思乡”主题显然带有某种象征性色彩，即对某种文化更原初的文化基因的回望。丁尼生对古希腊以来西方历史记忆中的反复重写毫无疑问折射出他的这一动机，而他数十年如一日对亚瑟王传说的频繁“回顾”更是集中体现他对不列颠民族共同体历史记忆的招魂。

众所周知，亚瑟王是中古传说时期不列颠最富传奇色彩的伟大国王。他的形象经过自远古凯尔特传说到中世纪骑士野史的漫长发育，并经《不列颠诸王史》（成书于12世纪）、《亚瑟王之死》（成书于15世纪）等巨著总成之后，千百年来一直是不列颠民族最引以为傲的文化遗产之一。经过千百年来不断的充实、转述和改写，围绕亚瑟王和他的圆桌骑士们形成极为丰富的故事集群，除了亚瑟王主线故事之外，围绕王后格尼维尔以及兰斯洛特、特里斯坦、高文、梅林等诸位骑士的故事同样精彩，此外还有王者之剑和圣杯追索的故事、卡米洛特王庭和阿瓦隆仙境的传说等，都早已成为不列颠民族的共同记忆。这些故事的影响事实上早已超出英伦诸岛，在欧洲大陆上广为流传。尽管如此，亚瑟王传说毫无疑问是最具“英国性”的故事集群，是不列颠民族探求身份认同的一个重要锚点。正如琼斯指出：“亚瑟王的神话在许多方面创造了中世纪文明。它也帮助创造了我们所知的英国。英国人或许创造出亚瑟王，但是亚瑟王反过来使英国作为一个伟大国家的理念合法化。”（Jones）

从这一点看，丁尼生对亚瑟王传说的改写便具有别样的厚重内涵。众所周知，从1832年发表《女郎夏洛特》开始，到1891年《国王田园诗》（*Idylls of the King*）完整版的面世，丁尼生对亚瑟王相关故事的兴趣一以贯之，对它们的创造性改写几乎从未停歇。这其中当然存在丁尼生对中世纪浪漫情爱、宫廷传说与骑士历险等故事的个人偏好，也是他对维多利亚时代亚瑟王传说在民间升温的积极回应，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丁尼生个人宏大艺术规划的一部分，那就是他试图将亚瑟王传说作为他所生活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一个寓言。这一点单纯从1891年完整版《国王田园诗》的结构便可见一斑。丁尼生这部史诗的主体部分共有十个相对独立的故事组成，由亚瑟王这一角色串接所有故事，然而诗歌的起篇题献给阿尔伯特亲王，终篇又在敬献维多利亚女王的《致女王》中结束。这样安排的意图可谓不言自明：如果说这部史诗的主体部分通过亚瑟王的加冕、征伐、婚姻和牺牲以及加雷斯与林内特、梅林和薇薇安、兰斯洛特和艾琳等人的故事，集中展现一个承载忠贞、正义、虔诚、道德、奉献等种种骑士美德的理想君王，那么，丁尼生在这部史诗的首尾处分别致敬阿尔伯特亲王和维多利亚女王的做法则直接宣告他的创作动机，那就是将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比作亚瑟王治下完美的骑士王庭。正是敏锐地洞察出丁尼生的这一动机，时任英国首相的格拉德斯通（William E. Gladstone）早在1859年《国王田园诗》第一部分初版之际，

便激动地宣称“它是民族的；它是基督教的”（转引自 Jump, 1967, p. 250）

当然，这样的比附并非单纯出于身为桂冠诗人的应景奉承，而是隐含着丁尼生对前文反复提及的一个问题的思考和回应，即殖民扩张时期的民族共同体身份认同危机。正因为此，丁尼生在诗歌中将阿尔伯特亲王赞誉为“我王的理想骑士”，认为他是亚瑟王种种美德的化身（Tennyson, 1891, pp. 7-9）；而在《致女王》中，他更明确地将这种“理想骑士”的精神视为挽救民族共同体身份危机的一剂良药：

在那片正北方向，我们近来听到

羞辱我们的一种腔调“管好你们自己；

这种忠诚太过昂贵！朋友们——你们的爱

不过是一份重担：松开绑绳，就此离开。”

这可是帝国的语调？这是我们统治者们

该有的坚定？……

……

……对国王的忠诚

就是对远方子弟的忠诚，他们深爱

我们的海洋帝国和她那无边际的家园

正在不断扩张的英格兰，她的王座

立于我们广阔的东方，一座岛屿，一座岛屿

不接受她的伟大：如若她知晓

并为之恼怒，那我们就都得倾覆。（Tennyson, 1891, pp. 358-359）

丁尼生对于帝国内异样的声音十分敏感乃至焦虑，这首《致女王》和前文提及的《洛克斯利田庄》及其续篇表达出同样的思想。诗歌中的“正北方向”指的是加拿大，《致女王》最初单独发表于1872年，这与1867年7月1日英国议会通过《1867年英属北美法》，将英

国在北美四块殖民地合并为加拿大自治领相去不远。《1867 年英属北美法》的通过标志加拿大联邦的起点，虽然此时的加拿大远非真正的独立，但是显然是继美国独立之后，对英帝国的北美殖民体系的又一次重击。对于殖民地的离心离德，丁尼生痛心疾首，对此，他苦口婆心地指出，对国王的忠诚就是对远方子弟的忠诚，并劝慰人民热爱“不断扩张的英格兰”。当然，相比于单薄的《致女王》中的宣示与直陈，《王国田园诗》的主体部分毫无疑问更含蓄然而也更有力度地回应了两者内蕴的共同问题：如何在殖民体系行将瓦解的时代维系或重构民族共识。正如同时代的阿诺德倡导文化教育的力量，丁尼生也试图通过汲取亚瑟王传说的民族精神力量，来重构和强化不列颠民族身份认同意识，对冲帝国殖民时代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然淡化乃至崩解的风险。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英国文学的命运共同体表征与审美研究”（19ZA293）的阶段成果。

Funding: This paper is an interim result of the Major Project of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und of China (NSSFC) “The Representation and Aesthetics of Community in English Literature” (Grant No. 19ZA293)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 declares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ORCID

Yang Guojing ^{ID} <https://orcid.org/0009-0006-1972-0966>

References

- Buckley, Jerome (1969). *The Victorian Temper: A Study in Literary Culture*. Harvard UP.
- Cobbett, William (1824). *Cottage Economy*. Charles Clement.
- Cobbett, William (1804). “Review of the Measures Relating to the Army.” *Political Register* (4): 100-126.
- Cobbett, William (1830). “To Big O.” *Political Register* (23): 728-735.
- Cobbett, William (1823). “To Mr. Hume.” *Political Register* (9): 562-565.
- Cobbett, William (1823). “To the People of Kensington, Chelsea and Fulham.” *Political Register* (4): 193-231.
- Coleridge, Samuel Taylor (1971). *The Collected Works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vol. 1. Lectures 1795. On

Politics and Religion. Princeton UP.

Dibdin, Charles (1845). *The Selected Songs of Charles Dibdin*. G. H. Davidson & Water Street.

丁宏为 (2009): “‘最悲惨的时代’——丁尼生的黑色诗语”, 《国外文学》(4): 61-68。

[Ding Hongwei (2009). “‘Wretchedest Age’: Tennyson’s Dark Verse.” *Foreign Literatures* (4): 61-68.]

Great Britain Courts (1844). “Review of *A Treatise on the Law Relating to Alien and Denisation and Naturalisation*.” *The Jurist* (Feb. 17): 51-52.

Harris, Bernard (2005). “Health by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2): 488-490.

荷马 (2003): 《奥德赛》, 王焕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Homer (2003). *Odyssey*, trans. Wang Huanshe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Jefferies, Julie (2005). “The UK Population: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n Roma Chappell (Ed.), *Focus on People and Migration*. Palgrave MacMillan: 1-17.

Johnson, Samuel (1968). “The Patriot.” In J. P. Hardy (Ed.), *The Political Writings of Dr. Johnson*. Barnes & Noble: 91-99.

Jones, Jonathan (2024). “King Arthur Forged Our Britain.” *The Guardian* 23 Mar, 2016. Web. 28 Oct.

Jump, John Davies (1967). *Tennyson: The Critical Heritage*. Routledge.

Land, Isaac (2009). *War, Nationalism, and the British Sailor, 1750-1850*. Palgrave MacMillan.

Malthus, Thomas Robert (1872).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Rpt. Ed. Reeves & Turner.

Marshall, George O. (1963). *A Tennyson Handbook*. Twayne.

Mathur, Saloni (2007). *India by Design: Colonial History and Cultural Display*. U of California P.

More, Hannah (1840). *The Works of Hannah More*. Vol.1. Harper & Brothers.

Pooley, Siân (2013). “Parenthood, Child-rearing and Fertility in England, 1850-1914.” *The History of the Family* (1): 83-106.

Tennyson, Alfred (1891). *Idylls of the King*. Thomas Y. Crowell & Co.

丁尼生 (1995): 《丁尼生诗选》, 黄杲炘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Tennyson, Alfred (1995). *Poems*, trans. Huang Gaoxin.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Tennyson, Alfred (1970). *Works of Alfred Tennyson*, vol. 2, 6, 7, edited by Hallam Tennyson. Greenwood.

Tromp, Marlene (2013). “The Pollution of the East: Economic Contamination and Xenophobia in Little Dorrit and The Mystery of Edwin Drood.” In Marlene Tromp, Maria K. Bachman & Heidi Kaufman (Eds.), *Fear, Loathing, and Victorian Xenophobia*. Ohio State UP: 27-55.